

跟死神賽跑

投効空軍憶抗戰

●夏功權

赴美受訓濟濟多士

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初，航校甄選學員赴美受訓，我通過考試及體檢等入選，不合格者仍留校飛行。此係第三批赴美鳳凰城受訓者，總領隊譚以德，領隊董明德，副領隊劉宗武，共有學員一百四十七名，十一位翻譯，其中第十三、十四期各七十位，另外有第十二期學生六位，較有名者：第十二期——陳鴻銓、汪夢泉；第十三期——汪正中、彭傳樑、剛葆璞、劉萬才、吳捷松、黃翔春、趙子清、周石麟、劉紹堯、盧盛景、黃雄盛、徐天齊；第十四期——郭汝霖、左宗惠、關振民、雷光照與衛立煌等人。我們幾經周折，由昆明飛印度加爾各答，轉火車到孟買，搭「巴西號」運輸艦經南非開普敦，於民國三十二

年六月抵達美國紐約。在旅程中我擔任秘書，所以有打字機可用，戰時運輸艦夜間不許開燈，我上午教英文，下午跟一位從遠東印度撤退的女士 Mrs. Jackson 學法文，晚上把法文字典打字抄寫一遍，就這樣度過了六十五天。

初抵紐約，就有一個民間組織——Gray Lines 有計劃的招待我們參觀遊覽，該組織的工作人員身著灰色制服，完全義務提供私人汽車、汽油，雖然僅有一天，卻讓我深深感覺到美國人的愛國情操，一切都為了國家。我們的人民在抗戰中因物資缺乏，人情味道也縮短了。

翌日，我們搭火車到美國西部，車上有美國空軍學生，他們見到中國空軍學生，興奮得不得了，問長問短，問到我們抗戰的情形，我才曉得，美國各地的報紙和

(中)

電台，除了幾個大都市以外，報導的都是瑣碎的地方新聞，不把世界局勢當作重要消息，美國空軍學生聽了我們的形容後，才恍然大悟，我們為什麼要作殊死戰。

在三天三夜的旅程中，發生了一件趣事，我早上盥洗時，用長剃鬚刀剃鬚子，火車搖晃得很厲害，美國學生都是用刀片，看到我長刀，一個個都看呆了，想想我會不會割破喉嚨，但是我保持鎮靜的剃鬚子，剃完後就把刀子收起來，那些美國學生才鬆了一口氣，我連續三天都用這種方式剃鬚子，沒有流血，真是好運氣。經過新墨西哥到了亞歷桑那的鳳凰城，我們搭夜車直赴威廉機場，當時軍營尚未建好，我們只得住在帳篷，正值六月天氣酷熱，白天到帳篷取物，必須先在篷外吸口氣，再進入帳篷拿東西，拿了東西後必須

立刻折回，而且不能喘氣，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滾燙的。傍晚救火隊會來灑水，一澆水，沙漠裏特有的大蚊子就誕生，但是不幾小時就死亡。

我們在鳳凰城雷鳥機場練習飛行，使用的是雙翼機（TP-17型）。訓練分為初、中、高級，每級各九周，中間隔一周，結束後開始下期訓練。初級由三十五歲以上民間飛行專家任教官，免服兵役；中高級以上則由軍人任教，九個月即可畢業，這在缺乏飛機、汽油的國內，得花上幾年功夫。

俯衝轟炸極易出事

這些教官起初教中國學生，有點費力，因為中國學生十之八九不識英語，而中國的姓氏簡單，教官弄不清楚，所以就吧中國學生編號。第一、二批為一九四二年初抵美國者，每批有五十人，所以編號是第一批一〇一至一五〇，第二批一五一至二〇〇號。我們第三批是第十二期排在前面，接下來是十三期同學及十四期同學，編號從三〇一開始，最後是三三七號，我的編號為三〇九。我在第三批是變相的秘書，學校一有事，就用擴音器廣播找三〇

九號學生，除了飛行上課以外，我就替領隊及學生辦事，不到兩個月，我得了盲腸炎。開刀以後，因時間延誤，就降到第四批。第四批領隊是楊少校，他因為我是第三批降下來的，就叫我作隊長。三月結業，我就到亞歷桑那州祖森（Tucson）地區的馬拉那機場，受中級訓練，然後再到鳳凰城進威廉機場學習轟炸，那時期飛的是AT-9與AT-13，AT-9頗不容易飛，在降落時五百尺處要俯衝一下，但是如果稍微慢一點拉起來，飛機就會撞地。訓練期間，中國學生沒有出事，倒是美國學生有二次因為沒有拉起來而撞地失事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，我自鳳凰城的威廉機場結業，就到科羅拉多州的拉亨打（La Junta）機場學習操作輕轟炸機B-25，結業後立即進入德州聖安東尼（Saint Antonio）美國中央航空學校，受三個月教官訓練，然後又折往德州奧斯汀（Austin）儀器教官學校受訓。這一批共有三位中國軍官，即楊新國、我和一位吳姓同學，我們是首批受訓的中國軍官，也是第一批外國人。飛行員平時訓練失事死亡比例遠較作戰陣亡高出很多，主因是缺乏儀器飛行訓練，一旦受天候等影響，就容易肇事。（按

：空軍官校儀器組於民國四十一年正式成立，由楊新國、夏功權主持）

一九四三年底畢業時，因為美國空軍的教官畢業於儀器飛行學校者不多，而當時戰事非常緊張，於是我們三個人也必須加入測驗學生的行列。當時中國學生並不多，大部分都是美國學生，雖然那時我們才二十幾歲，但連續測驗了兩個星期，我們的身體亦大感吃不消。不過戰局的逐漸好轉卻給我們一種鼓勵。

我從儀器教官學校畢業，就到拉亨打機場，教十五期同學炸射和低空投彈，美國教務長責備我們教官的炸射不好，便一同來督察。我有二個學生，一位邱姓，另外一位為黃姓，他二人因為初次炸射，勉強及格。而教務長自己駕駛時，掃射不是太低，就是太高，連低空投彈，也不能中靶。後來他叫我飛，我坐在右邊教官座上，既沒有瞄準儀，連儀表也都對正在駕駛座前面，而我們飛的是左航線，對在教官座的我而言更是吃力。在五百英尺處我對正了靶，起初掃射稍低，一剎那間我就瞄準了靶中心，幾秒鐘就把靶中央掀去了一大部，接著投彈，僅發射一枚炸彈，姓黃的同學就從機械士舵望下去，大喊「靶不

見了」，我們回到機場時，教務長一聲沒響就下飛機了。

民國三十二年底，眼看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五、六年，我卻未曾和日軍照過面，而當初志願投効空軍，即是爲了報效國家，但是我卻在美國受訓，都沒有打過仗，恐將慚愧一生。因此乃向總領隊賴名湯呈遞報告，希望能回中國作戰，幸能獲允。與我同回中國參戰的教官尚有一陳姓隊員，他隸屬於驅逐隊，我則屬轟炸隊。

艱鉅任務朝不保夕

民國三十三年初，我帶領一批十六期學員，共二十名畢業生，與陳姓教官自洛杉磯分乘兩船返國。我們這艘船在澳洲墨爾本停留三天，墨爾本是歐洲博物館的避難所，歐洲各大城市的油畫都在該城的博物館暫藏，我受益良多，日後雖遍遊歐美，但因職責在身，再也沒有看過這樣多的油畫。從長堤經澳洲到達印度加爾各答，在當地接受一批 B-25 飛機，直飛昆明交機。當時指揮官是美國將軍，分派機上任務時，他先看我們的資格，見我是儀器學校畢業，指派我爲正駕駛。由於行李重量受限，只許帶二件行李，我爲了替犧牲的

驅逐隊教官韓翔和閻儒香帶行李，就自行將行李放到加爾各答的航空委員會辦事處，等到我二次接機的時候，去找行李，結果都不見了。

關於閻儒香，我有一段奇特的經歷。閻儒香是我十四期同學，浙江諸暨人，英文程度不好。他從雲南北上到空軍爲止，一路跟我在一起，我除了教他英文，也交換很多他不曉得的事。我們在美受訓時，有一次我和劉德敏（曾任民航局局長、華信航空公司董事長及華航董事長），從科羅拉多調到鳳凰城，路經大峽谷，在大峽谷遊歷了五天，夜宿剛興建的 Motel。翌晨劉洗臉回來，我告訴他，昨晚我夢見閻儒香，他對我打躬作揖，還說天亮就可以看到他了。然後我和劉聊了一下，之後便到機場。這時教官們已去飛行，葛振先領隊說：「閻儒香的事你曉得嗎？」我答不曉得。他說：「他（閻）三天前被火車撞死了。」我聽後大愕，問劉記不記得我剛才告訴他什麼？劉一想，頭髮都豎起來了。

但當時外匯利率的差距很大。閻儒香出事後，我即寫信給我母親，要她稍微接濟閻儒香的父親。

後來我擔任 B-25 駕駛員，有時飛機難免「傷風咳嗽」，同事就說：「你沒關係，一個發動機是閻儒香，一個發動機是韓翔，你一定回得來。」不過這個「雙重保障」到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就不靈了，我的飛機被日本人打下來，在危急之中，我跳傘到國軍陣地，此是後話，下面再談。

碟仙預言死亡日期

我非常喜歡騎馬，在美受訓期間，與住在科羅拉多州的一位老醫生非常投緣，他養了許多馬，經常邀我去騎。一九四四年的母親節，因將回國，我就從亞歷桑那飛往科羅拉多探訪老醫生和他的太太，在 Lajuria 小城（西班牙語，意爲兩鐵路之交叉）歇宿一夜。我抵達時剛好下雨，不能騎馬，老醫生的女兒和她的兩位朋友提議玩一種叫 Ouija Board 的遊戲（按：類似台灣的「碟仙」）。大家按照遊戲規則把手放在盤子上，感覺有孤魂野鬼來，盤子就會推動，盤子動了之後，問鬼從哪裏來，

葬在哪裏，鬼都一一回答。那時傅保民（總統座機的副駕駛）加上左宗惠（左舜生的兒子）和我一共三人在玩，他們問傅有沒有女朋友？鬼答：「Yes」，又問女朋友在哪兒？鬼找了半天，說在重慶。時傅之女友在江津，離重慶很近。又問 Cousin 夏（我）有沒有女朋友？鬼說：「Yes」，但我從來沒有女友，就問鬼她叫什麼名字？鬼答：「China」，我們問為甚麼，鬼答：「He will die」但死字沒完，大家即嚇得把盤子推開，老太太對我說：「你不要相信這個，不要相信這個。」不過那時我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。

那天晚上仍舊下著雨，大家又玩 Out Board，我心裏想：若我為國而亡，是在哪一年？碟仙一點都不遲疑的答：「一九四五年五月」，別人不曉得問什麼事，傅保民說：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」不過我的一點都不在乎。

一九四五年四月，我和一個李姓同學發生誤會。那次是他第一次當正駕駛，而駕駛的是我的飛機，正要出發時，天氣忽然轉壞，美國隊長要我問中國隊長，是否需要更動駕駛員，我沒辦法，只好將此話傳達給董凱旋隊長，董說換人，就把這位

同學換下來，沒想到這位同學就與我正面衝突。快出發時，他到我屋裏來找我拼命，我把飛行的七件裝備，如地圖、保險傘都擺在桌上，槍則放在抽屜裏，他欲掏我的槍打我，我一見他找槍即翻窗逃避。他遂將我的衣服一吋吋的剪破。隊伍出發時，隊長問我這件事怎麼辦？我想我們兩人是同學（同是十三期入學，但我十四期才畢業），就跟隊長說：「假如不行的話，把我調差吧！」結果這句話卻得罪了隊長，而我竟全然不知。

原本我們奉命自四月二十八日起出勤轟炸日軍，炸完日軍後，我們就先將多餘的機械士送到重慶安置，欲返航時，接獲一電報：「夏功權在重慶待命。」亦即不准出任務。這對當時士氣高昂的軍人來說，不出任務意味著處罰，我有點惱怒，但是沒有辦法，只好留在重慶。

五月二十日，左宗惠從美國寫信來，說五月快到了，提醒我小心。我待在重慶也沒辦法。副隊長楊履祥是我初級班的教官，問我對隊長拿什麼翹？我說我沒拿翹。楊履祥說：「我們當你是有用的人，你卻跟隊長說把你調出去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我告訴楊履祥：「他是十三期，我是十

四期，我們倆衝突，當然調我走。」楊履祥「哦」了一聲，表示瞭解，對我說：「那麼你跟我的飛機（偵察機）一塊兒去（芷江）。」我乃隨他同往。

楊履祥教官駕駛的 B-1A 是小型飛機，連續三次試車轉速都不夠，我心想：我的命運不好，千萬不要把教官的命也帶了去。我對他說：「教官，你跟隊長說明白後，打個電報我再去，這樣妥當點。」楊履祥表示贊同，我下機後，飛機轉速也夠了，之後飛機一路平安抵達芷江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有一架 B-25 修好，要試飛，美國人因我對 VHF 無線電熟悉，因此叫我飛副駕駛的位置，連帶測試無線電，飛機飛上去後，輪子上不去，也下來，我們帶的六個美國機械士都沒辦法，最後油快乾了，才用機腹著陸，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飛機的。

六月三日，隊上才來電叫我歸隊，所以五月間我都沒有出過任務，不過隊上卻壞了兩架飛機。其中一架剛起飛不久，便發現一個發動機故障，機毀人亡。我遇到的怪事也過去了，只是覺得不可思議，那時我們懷著必死的決心，連「洋鬼」都知道。（未完待續）